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王安石诗文集

(一)

李 雯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二	员
书	员
答韩求仁书	员
答龚深父书	员
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	员
答王深甫书三	员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三	员
答徐绛书	员
答韶州张殿丞书	员
答司马谏议书	猿
答曾公立书	猿
与王子醇书四	猿
回苏子瞻简	源
答曾子固书	源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四	源
上相府书	源
上富相公书	缘
上曾参政书	缘
上执政书	缘
上欧阳永叔书	缘
答钱公辅学士书	缘
与崔伯易书	远

与郭祥正太博书三	迂
与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	迂源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五	远
书	远
与王逢原书七	远
与丁元珍书	苑源
上杜学士言开河书	苑
与马运判书	苑
答段缝书	愿
答姚辟书	愿
答史讽书	愿
上邵学士书	愿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六	愿
书	愿
上田正言书二	愿
上杜学士书	怨源
与孙莘老书	怨
上宋相公书	怨
上富相公书	员
上张枢密书	员
上郎侍郎书二	员源
上运使孙司谏书	员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七	员
上张太博书二	员
二	员
上人书	员源

与祖择之书·····	员远
与孙子高书·····	员愿
与孙侔书三·····	员园
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二·····	员猿
答孙元规大资书·····	员远
答王该秘校书二·····	员愿
答张几书·····	员园
答杨忱书·····	员员
答陈□书·····	员猿
答王景山书·····	员缘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八·····	员苑
答蒋颖叔书·····	员苑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九·····	员怨
贺韩魏公启·····	员怨
王安石文集卷八十二·····	员员
虔州学记·····	员员
君子斋记·····	员苑

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二

书

答韩求仁书

比承手笔，问以所疑，哀荒久不为报。勤勤之意，不可以虚辱，故略以所闻致左右，不自知其中否也，唯求仁所择尔。

盖序《诗》者不知何人，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。故其言约而明，肆而深，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，不当疑其有失也。二《南》皆文王之诗，而其所系不同者，《周南》之诗，其志美，其道盛。微至于赳赳武夫、《免置》之人，远至于江汉、汝坟之域，久至于衰世之公子，皆有以成其德。《召南》则不能与于此。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，而系之召公者也。夫事出于一人，而其不同如此者，盖所入有浅深，而所施有久近故尔。所谓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者，《诗》之《序》固曰：“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”然所谓《大雅》者，积众小而为大，故《小雅》之末，有疑于《大雅》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又作诗者，其志各有所主，其言及于大，而志之所主者小，其言及于小，而志之所主者大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司马迁以为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，《小雅》讥小己之得失，而其流及上。此言可用也。又宣王之《大雅》，其善疑于小；而幽王之《小雅》，其恶疑于大。盖宣王之善微矣，其大者如此而已；幽王之恶大矣，其小者犹如此也。凡《序》言刺某者，

一人之事也；言刺时者，非一人之事也。刺言其事，疾言其情。或言其事，或言其情，其实一也。何以知其如此？《墙有茨》“卫人刺其上也”，而卒曰“国人疾之，而不可道也”，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刺乱，为乱者作也；闵乱，为遭乱者作也。何以知其如此？平王之《扬之水》，先束薪而后束楚，忽之《扬之水》，先束楚而后束薪。周之乱在上，而郑之乱在下故也。乱在上则刺其上，乱在下则闵其上，是以知其如此也。管、蔡为乱，成王幼冲，周公作《鸛鸣》以遗王，非疾成王而刺之也，特以救乱而已，故不言刺乱也。言刺乱、刺褊、刺奢、刺荒，序其所刺之事也。言刺时者，明非一人之事尔，非谓其不乱也。《关雎》之诗，所谓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者，孔子所谓“哀而不伤”者也。《何彼秣矣》之诗所谓“平王”者，犹格王、宁王而已，非东周之平王也；所谓“齐侯”者，犹康侯、宁侯而已，非营丘之齐侯也。《郑·缁衣》之诗宜也、好也、席也，此其先后之序也。此诗言武公父子善善之无已，故《序》曰“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”。席，多也；宜者，以言其所善之当也；多者，以言其所善之众也。《缁衣》者，君臣同朝之服也；“适子之馆者”，就之也；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粢者，举而养之也。能就之，又能举而养之，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，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。夫有国善善如此，则优于天下矣，其能父子善于其职，而国人美之，不亦宜乎？《生民》之诗，所谓“是任是负，以归肇祀”者，言后稷既开国，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，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。所谓“印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”者，言我既为天子得祀，则盛于豆登，其香始升，而上帝居歆尔，非以

为后稷得郊也。其卒曰“故臭亶时，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”者，言上帝所以居歆，何臭之亶时乎？乃以后稷肇祀，则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，得郊祀之时尔。盖所谓“文武之功，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”者此也。卫有邶、磨之诗，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、磨而取之，理或然也。既无所受之，则疑而阙之可也。

意诚而心正，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。故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此诗之言，故曰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”也，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。吾之所受者为此，则彼者吾之所弃也。所谓“彼哉彼哉”者，盖孔子之所弃也。孔子曰：“管仲如其仁”，仁也。扬子谓“屈原如其智”，不智也。犹之《诗》以不明为明，又以不明为昏。考其辞之终始，则其文虽同，不害其意异也。忠足以尽己，恕足以尽物，虽孔子之道，又何以加于此？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，神明不测，非忠恕之所能尽。虽然，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。“好勇过我”也者，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。能勇而不能怯，非成材也，故孔子无所取。古者凤鸟至，河出图，皆圣人在上之时。其言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”者，盖曰无圣人在上而已矣。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，所谓美人也。其于尊五美，屏四恶，非待教也。若夫郑声佞人，则由外铄我者也。虽若颜子者，不放而远之，则其于为邦也，不能无败。《书》曰：“能哲而惠，何忧乎肯兜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”由此观之，佞人者，尧、舜之所难，而况于颜子者乎？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，言而已。言之入人，不如声之深，则郑声之可畏，固又甚矣。孔子曰：“如有所誉，其有所试矣。”谓颜子“三月不违仁”者，盖有所

试矣。虽然，颜子之行，非终于此，其后孔子告之以“克己复礼”而“请事斯语”矣。夫能言动视听以礼，则盖已终身未尝违仁，非特三月而已也。语道之全，则无不在也，无不为也，学者所不能据也，而不可以不心存焉。道之在我者为德，德可据也。以德爱者为仁，仁譬则左也，义譬则右也。德以仁为主，故君子在仁义之间，所当依者仁而已。孔子之去鲁也，知者以为为无礼也，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也。以微罪行也者，依于仁而已。礼，体此者也；智，知此者也；信，信此者也。孔子曰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”，而不及乎义、礼、智、信者，其说盖如此也。扬子曰：“道以道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，礼以体之，天也。合则浑，离则散，一人而兼统四体者，其身全乎。”老子曰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”扬子言其合，老子言其离，此其所以异也。韩文公知“道有君子有小人，德有凶有吉”，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，此为不知道德也。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此孟子所谓天之天任者也；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，此孔子所谓小器者也。言各有所当，非相违也。

昔之论人者，或谓之圣人，或谓之贤人，或谓之君子，或谓之仁人，或谓之善人，或谓之士。《微子》一篇，记古之人出处去就，盖略有次序。其终所记八士者，其行特可谓之士而已矣。当记此时，此八人之行，盖犹有所见，今亡矣，其行不可得而考也。无君子小人，至于五世则流泽尽，泽尽则服尽，而尊亲之礼息。万世莫不尊亲者，孔子也。故孟子曰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孟子所谓“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者”，先儒以国中之地谓之廛，以

《周官》考之，此说是也。廛而不征者，赋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征其货；法而不廛者，治之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赋其廛。或廛而不征，或法而不廛，盖制商贾者恶其盛，盛则人去本者众；又恶其衰，衰则货不通。故制法以权之，稍盛则廛而不征，已衰则法而不廛。文王之时，关讥而不征，及周公制礼，则凶荒札丧，然后无征，盖所以权之也。贡者，夏后氏之法，而孟子以为不善者。不善，非夏后氏之罪也，时而已矣。责难于君者，吾闻之矣，责善于友者，吾闻之矣。虽然，其于君也，曰“以道事之，不可则止”；其于友也，曰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”。王欢于孟子，非君也，非友也。彼未尝谋于孟子，则孟子未尝与之言，不亦宜乎？

求仁所问于《易》者，尚非《易》之蕴也。能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之言，则此皆不问而可知。某尝学《易》矣，读而思之，自以为如此，则书之以待知《易》者质其义。当是时，未可以学《易》也，唯无师友之故，不得其序，以过于进取，乃今而后，知昔之为可悔。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，追思之，未尝不愧也。以某之愧悔，故亦欲求仁慎之。盖以求仁才能而好问如此，某所以告于左右者，不敢不尽，冀有以亮之而已。至于《春秋》三传，既不足信，故于诸经尤为难知，辱问皆不果答，亦冀有以亮之。

【译文】

接到你的信，问我你的疑难，很惭愧搁置了很久没有回信。你勤于学问的心意，不可以辱没了，因此简略的把我知道的告诉你，我自己不知道对不对，只有求仁你来选择了。

作《诗经》序言的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不是通达了先王的意旨的人不能作到这一点的。因此他的言辞简单且明了，恣肆又深奥，一定要仔细的考虑和熟练的讲解它，不应当怀疑它有错误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都是文王所作的诗，但所说的事情不一样。《周南》里的诗，含义美好，道义十分丰富。小到赳赳夫和《兔爰》里的人，远到长江、汉水、汝山的地方，久远到处于衰王时代的王子，都能够成就他们的德行。《召南》则不能这样。这是诸侯国的风诗，却托为召公所作。事情出自于一个人，而它们的不同却如此之大，大概是因为进入的有深浅，而所施行的有长久和近期的区别。所谓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，《诗经》的《序》里固然说过：“政事有大有小，因此有了《小雅》，有了《大雅》。”然而所谓《大雅》其实是积聚了众多小的事情而成为大的，因此《小雅》末尾的诗，有人怀疑是《大雅》，这不可以不知道。又因为作诗的人，他们的意旨各有寄托，有些说的事情大，而目的所在却小，说的事情小意旨所在却很大，不可以不知道这些。司马迁认为《大雅》说的是王公大臣的事，而其德政却施及平民，《小雅》讥讽个人的得失，却意旨指向上层。这个看法可以采用。又宣王的《大雅》，他的好处被怀疑很小，而幽王作的《小雅》他的恶行被怀疑为很大。大概宣王的善行太小了，它的大的地方仅止于此而已，幽王的恶行太大了，其中小的止于这些而已。凡《序》中说“刺某”的，一定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说“刺时”的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。“刺”是说事情，“疾”是说个人的情感，有的说事实，有的写情感，其实质是一样的。从哪里知道了这些呢？《墙有茨》说“卫人讽刺他们的君主”，而最后又说：

“国中的人痛恨这些，却不能说呀！”因此知道应该是这样。讽刺作乱，是作乱的人作的；关心乱世，是遭遇祸乱的人作的。从哪知道的这些呢？平王的《扬之水》，先捆了柴再捆草，忽作的《扬之水》先捆了草，再捆柴。那是因为周的混乱出在上层，而郑国的混乱是从下层开始的原因。乱出现在上层，就讥刺上层，乱出现于下层就关心上层，因此从这里我知道了这个道理。管叔、蔡叔作乱的时候，成王还年幼，周公作《鸛鸣》诗给成王，并不是恨成王讥刺他，而是为了拯救乱世而作的，因此不说是“刺乱”。说“刺乱”、“刺褊”、“刺奢”、“刺荒”，序是写诗中所说的事情的。说讥刺时政的，可以明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但并不是说不混乱。《关雎》一诗所说的“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”，孔子说是“悲哀却不过分”。《何彼秣矣》诗中所说的“平王”，就象是格王、宁王，不是东周的平王，所说的“齐侯”就象是康侯、宁侯，不是营丘的齐侯。《郑风·缁衣》一诗，序中说是“宜也”、“好也”、“席也”，这是前后不同的序。这首诗说武公父子作善事没有止境，因此《序》说“使有国家的人明白为善的功绩。”“席”，就是多了；“宜”，是说其所作善举的适当。“多”是说他们善行所施及的人之多。《缁衣》是君臣共同朝贺时的服装。“适子之馆”是接近他；为他作了缁衣再给予他，提拔他，养着他。能够接近他，又能提拔和养着他，这就是作君主的善行，与匹夫的善行有所不同，如果君主的善行是这样，那么就会超出天下的诸侯，那些父子都忠于职守，国内的人都赞美他们，这不是很合适吗？《生民》诗中所说的“是任是负，以归肇祀”（背着谷子，归之于祭祀）是说后稷开国之后，背着所种的谷子交

在祭祀礼上，而不是说在郊外作祭祀。所谓“糝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”，是说我作为天子作郊祀，就把祭品放在豆和登中，它们的香气上升，上帝享受它，而不是后稷的郊祭。《序》最后说：“故臭亶时，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”是说上帝所享受的，在亶时是什么味道吗？那是因为后稷的祭祀，可以没有什么罪过，到了今天，在郊祭时得到的。大概所谓“文武之功，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”（文、武功绩，都是起于后稷的，因此推他来和天相配）。卫周有《邶风》，邶风，说卫是在后来吞并了邶、鄘而得来的，可能是这样。既然没有交给，那怀疑并且存缺就可以了。

意旨诚实那么心就正，心正了那么作什么事都正。因此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三百首诗，用一句话概括它”并不是认为其它的经与此不同。我所接受的是这些，那么那些就是我所抛弃的东西。所谓“彼哉彼哉”（他呀！他呀！）就是孔子所要抛弃的。孔子说：“管仲很仁”是仁，扬雄说：“屈原有智慧”是不智呀！就像《诗经》中以不明为明，又以不明为昏暗一样。考察它文辞的全部，那么文辞虽同，不妨碍意义的不同。忠心足以使自己全部奉献，恕足以施及于所有的事物，就是孔子的道又可以比这多加点什么呢？而评论的人认为孔子的道，连神明也不能明了，并不是忠、恕可以概括穷尽的。虽然如此，但这并不是孔子告诉曾子的。“好勇过我”（喜好大勇超过我的），是说只能勇却不能怯懦的人。能勇却不能怯并不能成材，因此，孔子不采用。古代时，凤凰来到，黄河献出图书，都是圣人在位的时代。孔子说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”（凤凰不来，黄河不献出图书），

大概是说君位上没有圣人。颜渊具有孔子的大体却小于孔圣人，是所谓的美人。他尊重五美，而摈弃四恶不是等待教诲呀！郑卫之音和奸佞之人是外来销损我们的东西，虽然是颜渊这样的美人，如果不使这些东西远离自己，那么对于国家来说，也不能不衰败。《尚书》说：“能贤明而且正直那么又忧虑驩兜（古之大恶人）干什么呢？又为什么害怕巧言令色的大奸佞呢？”由此看来，奸佞之人，对于尧舜来说也是他们的烦难之事，何况对于颜渊呢？奸佞之人之所以能打动人心，是因为言辞。言辞在打动人上又不如声音深入，因此郑声的可怕，当然更厉害了。孔子说：“就象有声誉一样，他一定有尝试的。”说颜渊“三个月不违背仁道，”大概是有所尝试吧。虽然如此，颜渊的行为没有在此终止，后来孔子告诉他“克制自己恢复礼教”的话，叫他遵守这句话。能够说话行动观看倾听都遵守礼的规定，那么就可终生不违背仁道了，不仅仅止于三个月。这说出了道的全体，是无处不在，没什么不能作的，求学的人不能依照它，不可以不存心于此呀！道在我身上的体现就是德，德是可以据有的。以德来爱就是仁，仁就象左，义就象右。德是以仁为主的，因而君子在仁义二者之中，所应当依附的是仁。孔子的离开鲁国，知道的人认为是违礼的行为。这是孔子想去除罪行。去除罪行，是依附于仁。礼是体现仁的，智慧是知道明白仁道的，信义，是相信这些。孔子说“存志于求道，依据德行，依附于仁。”而不说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他的说法大概如此吧。扬雄说：“道用来说明，德用来得到，仁用来爱人，义用来使之相宜，礼用来体现，这就是天道。合在一起就混然一体，分开了就各自离散，一个人兼有了四体，他就

全面了。”老子说：“四体之中，失去了道，而后就只有德，失去了德这一体就只有仁，失了仁这一体就成了义，失去了义就成了礼。”杨雄说它的合的一方面，老子说的是相离的一方面，这是有不同的原因的。韩愈知道“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，德也有凶有吉。”而不知道仁义和道德没有不同，这是不明白道、德呀！管仲九次汇合诸侯，匡请天下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的人；管仲不能象圣人那样使自身正了就可以使物正，这就是孔子说的小器呀！他们的话各有适应的范围，不是相互违背。

过去议论人，或者称之为圣人，或称之为贤人，或称之为君子，或称之为仁人，或称之为善人，或称之为士。《微子》这篇文章，记叙了古人的行为举止，大概大略有一定次序。篇末所记叙的“八士”他们的行为仅可称之为“士”而已。当时记述这些的时候，这八个人的行为，大概还就象见到了一样，现在消失了，他们的行为不能考察到了。无论君子和小人，到了五代之后亲缘关系就终止了，亲缘关系终止了，那么丧服的五服也就到头了，因而尊敬亲人的礼节就没有了。万代都尊重亲近的人是孔子。所以孟子说：“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弟子，我是私淑于他们的。”孟子所说的“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”是说，先代的儒士把国家的土地叫“廛”，用《周官》来考察它，这个说法是正确的。“廛而不征”是收他卖地的廛，而不征收财物。“法而不廛”是说用市官的法律来管理，不收他的土地。或者“廛而不征”，或者“法而不廛”，大概是限制商人讨厌他们的兴盛，商人这个行业兴盛了，那么人们离开自己本业（农业）的就多了，但又害怕商业衰亡，因为商业太不行了，货物就不流通。因

此用法律来权衡，稍微兴盛得超过标准就“麇而不征”，不景气就“法而不麇”。文王的时候，关口上只是查问却不征收税金，到了周公制定礼法时，则规定天下收成不好才不再征收，这大概是权衡的原因。进献贡品，是夏代的法律，而孟子认为不好。不好，并不是夏后氏的罪过，是时代的原因。责难君主的，我听说了，责难朋友的，我也听说过。虽然如此，对于君主，就说：“用道来侍奉他，不可以就停止。”对于朋友说：“忠告他并且很好的开导他，不可以然后就停止。”王欢对于孟子，不是君主，也不是朋友，他并没有和孟子有什么交道，因此孟子没和他说过话，不也是很合适的吗？

求仁所问的关于《易》的问题，尚且不是《易》的深刻内含。能够完全明白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里的话，那么这些不问也可以知道了。我曾经学过《易》，读了并且思考。我自己认为是这样，那么写下来等待明白《易》的人来探求它的义理。那时候，不应该学《易》是因为没有师长朋友的原因，不能明白其中的次序，因而过于想求知进取，现在知道过去的行为值得后悔。而那本书已经被不明白的人传抄了，追想这件事，很惭愧。因为我的惭愧和后悔因而请你慎重。因为你有才又好问，因此我不敢不把知道的告诉你，希望能指导你。至于《春秋三传》，不足以信，因而在诸经书中最难明白，问题都不能回答，也希望能指引你。

答龚深父书

某得手笔，感慰，尤喜侍奉万福。所示王深父事甚晓。然不为小廉曲谨以投众人耳目，而趣舍必度于仁义，是乃深父所以合于古人，而众人所以不识深父者也。言之于深父何病？扬雄亦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，不修廉隅，以微名当世。故某以谓深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。扬雄者，自孟轲以来，未有及之者。但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尔。孟轲，圣人也。贤人则其行不皆合于圣人，特其智足以知圣人而已。故某以谓深父其智能知轲，其于为雄几可以无悔。扬雄之仕，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，奈何欲非之乎？若以深父不仕为过于雄，则自雄以来，能不仕者多矣，岂皆能过于雄乎？若以深父之不仕为与雄异，则孟子称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深父之于为雄，其以强学力行之所至，仕不仕，特其所遭义命之不同，未可以议于此。深父吾友也，言其美，尤不敢略，亦不敢诬，所以致忠信于吾友。然以久废学，恐所论尚不中，不惜更详喻及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收到了你的信，十分感激又欣慰，特别高兴的祝你万福。所示及的王深父的事很明白。然而，不作小小的廉举而使众人注目，取舍一切都用仁义来衡量，这乃是王深父与古人相合的地方，也是众人不理解他的原因。言辞对于王深父又有什么损害呢？扬雄也是用心在内在的修养，不注重外在的表现，不作一般的廉洁之举来赢得当世的名气。因此我认为王深父和扬雄相比没什么可后悔的。扬雄，从孟子以来没有人能和他相比。但是后代的士大夫们大多不能深入的了解

他。孟轲，是圣人。贤人就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全和圣人相合，仅仅是他们的智慧是可以了解圣人罢了。因此我以为王深父在智慧上可以了解孟子，他和扬雄也差不多了。扬雄的出仕，是合于孔子“无不可”的意思的，为什么要攻击他呢？如果认为王深父不出仕是超过扬雄的地方，那么从扬雄到现在，能不出仕的人多了，难道都能超过扬雄吗？如果认为王深父不出仕是与扬雄不同的地方，那么就不明白孟子说大禹、后稷和颜回是同道的道理。深父和扬雄相比，他们以强力的学习努力的实践为目标，仕和不仕，仅仅是他们的遭遇不同，不可用这一点来议论二人。深父是我的朋友，他的言辞十分优美，我不敢称颂他，也不敢乱说他，只是对我的朋友忠诚又有信义而已。然而因为荒废学业很久了，恐怕所讨论的不正确，那么可以更详尽的说给你。